

# 從「相忘於江湖」到「分庭抗禮」

## ——清初至當代基隆市客家認同的形成

陳麗華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所

### 提要

本文試圖透過清初至當代基隆市客家認同的形成過程，探究臺灣社會族群意識的衍生機制，及歷史資源如何在社會與學術脈絡中被反復重構。在基隆市的歷史當中，客語人群活躍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清中期。日治中葉的漢人籍貫調查顯示，當地曾是全臺灣福建汀州府籍講客家話人口最集中的區域。然而，這一群體的族群意識在當代並不明顯，多半消融於以姓氏宗親會及神明崇拜中，成爲一種集體的無意識。戰後來自臺灣各地的新客語群體，則紛紛依附於該地外省「廣東人」群體，從而形成共同的同鄉會組織。直至1970年代，基隆市都市發展導致會內財產爭奪劇烈，加之鄰近的臺北市發展成世界客家中心的刺激，新客語群體才脫離「廣東人」之殼，而另行成立以「客家人」為名的獨立社團。在當代的學術史敘述中，基隆從擁有一個規模頗小的客家社團，到被視爲曾存在龐大客家群體的區域，則是1990年代以降地方精英與學術團體將兩個斷裂的傳統糅合為一的結果。

**關鍵詞：**基隆市、客家、廣東、認同、宗親會

---

陳麗華，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所，臺灣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郵政編碼：30013，電郵：lhchen101@mx.nthu.edu.tw。

感謝基隆市巫賜銀、許月梅、劉美雲女士，劉阿進、潘淞浩、朱家聲、江純仁、葉秋林及陳雄等諸位先生對本文的大力協助，及惠賜寶貴資料。本研究部份田野調查得到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從鄉村到世界：臺灣客家人的流動經驗與族群認同（1920s-1980s）」（項目編號：Most 108-2410-H-007-018）之獎助；同時，匿名審查人亦對本文提出細緻的修改意見，謹一並致上深深謝忱。文中若有任何不當之處，文責由筆者自負。

## 一、引言：基隆與客家

在一般人的印象當中，位於臺灣島最東北角地區的基隆市，是著名的「雨都」與「港都」。雖然近些年由於氣候的變化及臺北港的興起，這兩個名稱均漸有名不副實之感；但其盛大的聯姓中元普渡和極具特色的廟口小吃，仍聞名遐邇。這樣一個都市，似乎與客家人的關聯並不大。然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客家研究蔚為興起的背景下，這一印象同樣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當學者開始帶着新的學術眼光，重新思量臺灣客家人歷史時，曾不斷追問的是：「什麼是客家？」以及「誰是客家人？」<sup>①</sup>。他們一方面質疑當代客家人的祖先是否客家人；另一方面又試圖追溯當代閩南人是否有客家淵源。他們也不滿足於單純的學理追問，更積極地走訪全臺各地，尋找散落各地的客家人遺跡，以便弄清楚「他們在哪裡？」。曾經隱而不彰的客家人群（例如福佬客）也被一一挖掘出來，進入人們的視野。<sup>②</sup>正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基隆市與客家人的關係漸漸有了更清晰的畫面，只是這一畫面中映照出的客家人，似乎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面貌。

其中一種論述認為，當地歷史上曾有大量的客家人活躍，主要是來自於福建省汀州府地區的客語人群。其依據在日治中葉的漢人祖籍統計中，數據顯示該地竟有近四分之一的汀州府移民。<sup>③</sup>儘管今天他們幾乎都不會講客家話，不過在研究者看來，仍是客家人勢力曾盛極一時的論據。與此歷史印象截然相反的，則是在當代族群認同上，認同客家族群的人群比例並不高。根據客家委員會2010年的調查，該地單一自我認同為臺灣客家人的人口約為22,900人，僅佔總人口的6.0%，遠低於全臺所佔比率的13.6%；而允許多重認同的情況下，這一比率雖提高至10.1%，亦低於全臺的18.5%。在全臺的都市地區，該地客家人口比率亦低於新竹、臺北、新北等城市，位居中下

- 
- ① 施添福，〈從臺灣歷史地理的研究經驗看客家研究〉，《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1998年10月），頁12-16；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 ② 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
- ③ 羅肇錦，〈臺灣客家的入墾與分佈〉，收入古國順主編，《臺灣客語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59；廖倫光，《臺北縣汀州客尋蹤》（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6）。

游。<sup>④</sup>

在筆者看來，上述兩種看似矛盾論述產生的原因，在於依據資料的產生時間及調查原則的差異。前者關注的是漢人移民的祖籍地，並不關心汀州府移民群體的語言及認同如何；後者則立基於當代的抽樣調查，關注的是已經經歷上百年變化之後的自我認同問題。而更深層的人群分類觀念轉折，則要深入基隆歷史上的人群及社會變化進行解釋。在兩次人口調查中間，還要提及一筆的新發展，是該地1974年成立基隆市客屬社團，僅次於臺北、高雄等地的中原客家聯誼會，是臺灣都市中較早以「客」為名的社團組織。這個社團折射出客家觀念在戰後基隆歷史上的轉折和變化過程。

筆者認為，重新回到歷史脈絡中，探究這座沿海都市地區「客家」群體的變化，既可以看出省籍、種族及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也可以看到當代學術觀念對於歷史的重塑，是我們理解戰後臺灣客家族群觀念形成機制的一個極佳例子。因此，本文試圖重新勾勒基隆市的客家畫面，以期豐富對於臺灣客家歷史的認識。

## 二、「相忘於江湖」：基隆市的汀州府移民

追溯歷史，基隆及附近地區的發展，可以追溯到15世紀。這一時期淡水和「鷄籠」（基隆舊名）由於中琉朝貢貿易、中日貿易，以及後來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在此建立貿易據點的關係而繁榮一時，不過後來由於外部貿易和政治勢力的改變而衰落。<sup>⑤</sup>現在講述基隆市街的發展，往往追溯到清初雍正時期在港口附近發展起來的坎仔頂街，乾隆年間又發展出新店街、暗街仔等。<sup>⑥</sup>至道光年間，姚瑩描述當時基隆的情況：「岸上居民鋪戶七百餘家，民居後一望平田，約將千畝。惟三面叢山峻嶺，土產無出，故無大行商，不能設口。」<sup>⑦</sup>該地與臺北盆地的關係亦極為密切，「淡水據北臺之樞，……其水自雞籠山而來，歷八堵、五堵，經圓山、關渡而入於海。旁流支脈，交

④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附表A-96、附表A-116。

⑤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⑥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臺灣之部》（東京：富山房，1909），頁23。

⑦ 陳培桂修，《淡水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據同治十年〔1871〕本重刊），卷15上，〈附錄一·文徵（上）·節錄臺灣十七口設防狀〉，頁405。

衍於艋舺、大稻埕之間」。<sup>⑧</sup> 這段描述淡水的話，點出基隆與淡水之間經由水路發展出的密切關係。

不過，相較於臺北平原地區的繁盛，基隆港市地區的發展並不突出。該地最古老的廟宇慶安天后宮建於清中葉。而直到晚清，現在號稱基隆三大廟的另外兩座廟宇奠濟宮（拜祭開漳聖王）、城隍廟才建設完成。進入日治時期後，在日本殖民政府築港和市區改正等措施之下，基隆的發展才日漸繁盛。日本領臺之後人口逐年上升，1920年全臺行政區劃變革之後，周邊19個莊亦劃入該行政區劃，其人口總數超過4.8萬人。1924年，基隆街從基隆郡獨立分出設市，人口已近5.9萬；至日治末期的1943年，基隆市人口已達10.8萬人；近20年的時間人口增長近一倍。戰後由於都市發展、交通建設等，基隆人口的成長更見迅速，2010年統計人口約為38.4萬人。但近年來由於港口淤塞、經濟不振，已經出現人口下滑趨勢。<sup>⑨</sup>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日治時期至戰後，基隆市人口中的日本人或外省人所佔比例頗高，均在三成左右。<sup>⑩</sup>

歷史上基隆市的人口當中，有多少客家人呢？可以說，日治時期開始有客家人向都市移民的過程，但其數量尚非常有限。從日治時期基隆人口統計的數據中，便可以鮮明地看到這一點。在1925年時，基隆市種族上的「福建人」（通常以講閩南話為特徵）達44,044人，而承認為「廣東人」（通常以講客家話為特徵）的人口僅有266人，只佔漢人總人口的0.6%。次年的統計籍貫為「廣東省」者，更只有0.2%。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部份登記為廣東種族者，實際上是福建省籍。<sup>⑪</sup>

雖然廣東人所佔比例甚低，但基隆市卻有另外一個異於全臺的鮮明特色，便是來自汀州府漢人的人口比例極高。在1926年所進行的漢人祖籍地調查中，當地汀州府移民有9,900人，在基隆市的總人口當中，佔23.5%的高比

⑧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5，〈疆域志·淡水縣〉，頁115。

⑨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進學書局，1946），頁82-83；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99年至100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附表A-96。

⑩ 儲有科等主修，洪連成編纂，《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政府民政局，1979），頁42。

⑪ 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大正十四年國勢調查結果表》（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27），頁160-161；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頁12-15。

例，更是當時全臺所有行政區中汀州府人口最多的。<sup>⑫</sup>汀州府雖然在清代的行政區劃上屬於福建省管轄，但是語言上卻與廣東嘉應州等客語區域相近，該地移民現今亦多被視為「客家人」。在當代客家研究者看來，這無疑是值得深究的現象，研究者根據此份資料，指出基隆和淡水在清末和日治初期，聚集了相當多的客家族群。<sup>⑬</sup>

為何基隆市會成為汀州府移民最多的地區呢？筆者猜測可能主要有如下原因：其一，就移臺過程而言，這些永定縣移民可能是與漳州府移民一起來的。當地最早的街道墩仔頂街，據說就是由來自八里坌的漳州人雍正初年建立的。而1926年人口統計也顯示，當地來自漳州府的漢人人口達20,000人，幾佔當地總人口的一半；而福建泉州安溪、同安與三邑加起來也只達漳州人口的一半。另外根據梁肇庭的研究，早在16至17世紀，福建汀州府的客家人，便在靛藍、蔗糖和木材等產業發展的吸引下，與漳州、泉州、延平等地移民向閩南沿海地區大量移民。<sup>⑭</sup>清初開海禁之後，客家人亦大量來臺，雖然在客家移民當中，嘉應州最多，惠州府其次，汀州府人數最少，但是很有可能他們亦隨着為數眾多的漳州府移民一起，移居北臺灣。

其二，就臺灣內部移民而言，汀州府人很可能來自於周圍北臺灣從淡水三芝至宜蘭的廣大地區，尤其是北部海岸地區。按照戰後初期《基隆市志》的記錄，「本市居民大多從八里坌、淡水等海岸逐漸經由金包里、萬里移入，一部份向宜蘭方面移墾，其後又從宜蘭逆移入基」。<sup>⑮</sup>這些地區便分佈着為數不少的汀州府移民，尤其是號稱「小基隆」的三芝，早在雍正年間，來自汀州府的江氏已移居此地，乾隆年間擴展至淡水及三芝八連溪一帶。翻查1960年的《臺北縣志》，其中便曰：「乾隆二十五年，永定人江慶玉來此闢八連溪地，是為本鄉開閉之始。」<sup>⑯</sup>而同書記載中，永定客家人開墾的還有諸多聚落。至嘉慶、道光年間，江氏家族更開枝散葉，向宜蘭、新竹及北

⑫ 其次為臺中州大屯郡（大部份屬於臺中市）3,500人，淡水郡3,400人，海山郡2,400人，嘉義郡、鳳山郡2,100人。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頁4-5。

⑬ 羅肇錦，〈臺灣客家的入墾與分佈〉，收入古國順主編，《臺灣客語概論》，頁59。

⑭ Leong Sow-The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 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5.

⑮ 儲有科等主修，洪連成編纂，《基隆市志》，頁37。

⑯ 戴德發監修，盛清沂纂，《臺北縣志》（臺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1960），頁17-19。

臺灣其它地區擴展。<sup>⑰</sup> 估計在之後的人口流動當中，有不少亦到達同樣位於北海岸的基隆市。

其三，則可能是由於日治時期當地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不斷有新移民補充。如在戰後初期編寫的地方志記載中，除了外來官宦和流寓外，本地各類人物有六十餘位，其中便有一位日治中葉移居當地的福建汀州府上杭人，以及一位汀州府永定縣的僧人。<sup>⑱</sup> 這顯示即使在日治時期，仍不斷有來自原籍的汀州府移民流入。

然而，儘管基隆市汀州府移民比例如此之高，在歷史上，甚至直到今天，他們卻從未彰顯出特殊的客語群體認同。這一方面與臺灣清初以來以省籍分類人群的傳統有關，當地人在日治時期的種族分類中，選擇成為「福建」種族，從而與其它來自廣東省、講客家話的群體分道揚鑣。另一方面則與城市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人群整合機制有關。在這兩點上，「客家」無論是語言的意義，還是族群的意義上，均未曾得到凸顯的機會。

基隆的汀州府移民籍貫上認同福建，而非廣東，可能有兩重原因：其一在於以福建籍作為自己的身份表徵，在當時的國家體制下更為有利；其二則是其移民已經居於臺灣幾代，語言早已經轉變。現在有關基隆市客家移民史常常強調的，晚清時期以基隆籍身份中舉的總共有三人（二文一武），其中一位光緒十五年（1889）的文舉人江呈輝（即江蘊玉，1872-1917），在入試時其填寫的祖籍便是福建汀州府的永定縣。<sup>⑲</sup> 他其實是成年之後方赴基隆，其活動區域原在淡水三芝、臺北大稻埕一帶。他的侄子即音樂家江文也，透過戴寶村收集的戶籍資料可知，在日治時期的戶籍登記當中，其種族欄均填寫的是「福」，亦即福建種族。<sup>⑳</sup> 在科舉考試的年代，其福建的省籍身份，無疑使其少了廣東省移民必須面臨的障礙；同時經過時移世易，其語言亦可能被為數更多的閩南話群體所同化。

江呈輝家族無疑是當地最顯赫的汀州人代表。江呈輝在當地是以整個社

⑰ 黃詩涵，《由古書契論北淡地區客家移墾——以汀州客江、潘二氏為例》（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頁126-127。

⑱ 基隆市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志·第20種·人物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9），頁35-36，1-57。

⑲ 薛紹元等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通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據光緒版原稿本標點排印），〈選舉·舉人〉，頁402。

⑳ 戴寶村，〈音樂家江文也的戶籍資料〉，《臺灣風物》，第39卷，第3期（1989年9月），頁Ⅲ-VI。

區的士紳領袖，而非單一府州縣士紳的身份活躍的。1895年後回到原籍，他仍活躍於教育界和文化界，臺灣的報紙亦對他有持續的關注。1917年江呈輝在永定高頭病逝後，在廈門曾為他開追悼會，並在永定高頭舉行盛大的葬禮。<sup>①</sup>在基隆，他亦留下為數眾多的痕跡。基隆最重要的節日慶典均和他有關係，三大廟中有兩個也和他有關係。

然而，似乎共同語言與籍貫的因素，仍持續影響着這一支汀州江氏認同的建構。追溯史料記載，會發現江氏至少參與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宗族活動，其一是與其它地區江氏宗族的互動；其二是以江氏的名義，參與基隆的聯姓組織（詳見下節）。直至日治時期，基隆江氏與桃園大溪的江氏仍然保持密切關係。1961年印刷的《（江氏）平和本派傳下族譜》，是桃園大溪地區的江氏編輯的，其家族宣稱祖籍為漳州府平和縣大溪，而其更早的祖先，則追溯到宋元之際死於兵難的永定高頭人江萬里（一世祖），其14世祖仕香公渡臺，居住於桃園大溪一帶。不過在當地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江氏非常清晰地選擇將自己定義為漳州人，他們在嘉慶十八年（1813）也參加了當地大料坎街上只有漳州人才有份參加的合股團體福仁季。<sup>②</sup>

在族譜的首頁，有一份1928年由江呈輝之弟江蘊和撰寫的序言，描述江姓的緣起，並曰「茲幸家族制風行於世，吾臺各姓後先成立，惟我江氏獨保向隅。汀漳泉臺宗親同此，感覺因有宗親會之組織，囑和草就緣起」。<sup>③</sup>既然曰「汀漳泉臺」，即包含福建各地及臺灣的江氏宗親。但是從實際參與的人來看，其實主要是福建汀州府永定與漳州府平和人士的聯盟。按照羅香林的定義，前者是福建八個純客家人定居的縣市，後者則是一部份住民為客家人的非純客住縣。<sup>④</sup>兩支江氏均將自己的祖先追溯到永定高頭的江萬里，顯示他們承認具有共同的來源。

由於歷史及地域的因素，可能大部份汀州移民仍未對客家有所認同。從基隆發展的歷史來看，基隆市雖然有高比例的汀州人，但並未形成統一的社

① 臺北縣三芝鄉公所編，《三芝鄉志》（臺北：臺北縣三芝鄉公所，1994），卷12，〈人物志〉，頁301-302；不著撰人，〈江先生葬儀〉，《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31日，版6。

② 傅寶玉，〈清代到日治初期民間信仰與大料坎內山村落的地方建構〉，《桃園文獻》，第6期（2018年9月），頁107。

③ 江蘊和，〈江姓緣起〉（1928），《（江氏）平和本派傳下族譜》（桃園縣大溪），1961，縮微膠捲，猶他家譜中心藏，微捲號1211005，臺北2。

④ 羅香林，〈客家源流考〉，收入羅香林主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崇正總會出版部，1950），頁53。

會組織，更從未參與客家族群的社團與客家意識的建構。那麼，汀州人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如何表達自己的認同，又如何參與基隆的區域整合過程呢？

### 三、廟宇與字姓會：不同來源群體的融合機制

從基隆市廟宇的發展、宗教祭祀活動及相應形成的姓氏組織上，我們依稀可以見到汀州籍人士（尤其是士紳階層）活躍的身影。今日的基隆號稱有三大廟宇，即拜祭天后的慶安宮、拜祭開漳聖王的奠濟宮和拜祭城隍爺的城隍廟。說起來，這三座廟宇均是道光年間以降才陸續興建的，並不是整個基隆地區歷史最悠久的廟宇（社寮島的天后宮據說可以追溯到18世紀中葉），不過，由於位於市街地區，並且由當地最重要的士紳群體大力倡導，遂奠定這些廟宇在當地社會生活中不可動搖的地位。而其中，汀州人江呈輝活躍的身影亦處處可見。

在這三座廟宇當中，根據日本人石坂莊作的記載，原本是第一大廟宇的天后宮為1830年由吳長歧、何聰等向基隆堡、三貂堡、金包里等地募金而建。其後，當地重要的士紳謝集成、許梓桑等均曾參與其中。<sup>⑤</sup>現在在慶安宮中有自修中心的設施，便名為「崇基書院」。在書院的金色招牌下，還供奉着孔子、倉頡和太上老君的牌位，號稱是當年崇基書院廢棄後，由書院移至慶安宮的。這是清末時當地所建的書院，江呈輝便是負責人，但這座書院是否曾實際運作值得懷疑，因為馬上臺灣便被割讓日本，江本人亦渡海回到中國大陸。

第二座廟宇奠濟宮則被視為漳州人群體的拜祭中心，據說由林本源家族獻地，市內士紳張金發、賴武等1875年募金建成；1899年再由張金發、江忠良募款重修。而第三座廟宇城隍廟，按記載由江呈輝和秀才張尙廉1893年募集8,000元所建，可能並未完工，1911年再由許梓桑等募款5,700餘元完成。<sup>⑥</sup>

在今日離基隆廟口夜市不遠的巷子中，還有一座福德祠，號稱位於以前的百年官道上。這座廟宇據說是江呈輝所建，我到訪該地時，年輕的廟祝卻強烈否認這一點，說早在他之前這座廟宇就已經存在，顯示地方社會對於廟宇起源的不同觀點，背後很可能顯示當地江氏亦有不同來源。

<sup>⑤</sup> 石坂莊作，《基隆港》（《中國方志叢書》本），頁153。

<sup>⑥</sup> 石坂莊作，《基隆港》，頁154。

在社會組織上，江氏亦同樣積極參與同姓會的建構。基隆市每年農曆七月十四的中元祭活動，已經成為全臺知名的民俗活動之一。按照當地人的說法，其時乃是「地官」生日，整個祭祀活動亦圍繞其慶祝活動展開。該活動的歷史據說可以追溯到清代咸豐年間，為了消弭漳、泉移民的械鬥，由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江、鄭、何藍韓、賴、許11姓每年輪值主普，當時形成的各姓組織便是後來宗親會的基礎。<sup>27</sup> 字姓輪值主普壇祭祀活動的傳統歷經更迭，由於城市的發展和歷史變遷，參與組織已經擴展到15大姓氏宗親會，由14個姓氏宗親會加上一個聯姓會（內部包含12個較小的姓氏）。由於部份宗親會是聯姓組織，所以實際參與的達28個姓氏。

各姓氏宗親會並不是當地唯一的社會組織，亦不是和宗教祭祀活動相關的唯一姓氏團體，但卻因其歷史悠久、規模龐大，而成為當地最引人注目的團體，亦成為學者研究當地社會組織的焦點。陳燕如在研究中發現，這11姓的成員，與晚清至日治時期基隆市街廟宇的倡導士紳，存在着高度重合，顯示這一活動是由當時在基隆佔有重要位置的士紳們聯合主倡的。而各姓人口的多寡、入墾基隆時間的先後，關聯性則遠遠沒有前者大。<sup>28</sup> 從一開始，這些姓氏組織便帶有強烈的地域色彩，聯合基隆及周邊地區同姓者的意義逐漸超越同宗的意義。不少宗親會早期以拜祭遠祖或神明的形式維持運作，亦暗示成員來源的多元。<sup>29</sup>

那麼，在這些姓氏宗親會當中，是否可以見到客語群體的身影呢？在2016年參與基隆市中元祭活動時，筆者曾就此詢問各姓氏宗親會的負責人，得到的答案不一而足。有人稱其實各個宗親會內部都有客家人，因為這些組織都包含很多不同來源的人；有人則稱江姓宗親會、劉唐杜姓宗親會以及後來加入的聯姓會當中的邱（丘）姓宗親會、鍾蕭葉姓宗親會等，裡面有較多的客家人，後兩姓是戰後方搬來基隆。

較早期的江姓宗親會，按照江姓宗親會的總幹事江純仁的介紹，現在宗親會有會員二百多戶，在諸宗親會中算相當少的。內部的江姓主要有兩大支派，其中一支是早期來源於福建永定的江氏，以濟陽為堂號，人數較多；另

<sup>27</sup> 陳燕如，《中元普度與政商之間：日據時期基隆地方領袖的發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未刊碩士論文，1998），頁80。

<sup>28</sup> 陳燕如，《中元普度與政商之間》，頁80-90。

<sup>29</sup> 如基隆第二大姓林氏，同治年間即為祭典組織「姑婆會」，以拜祭媽祖的形式凝聚同姓者。李豐楙等編撰，《雞籠慶讚中元——己卯年林姓主普紀念專輯》（基隆：基隆市林姓主普祭典委員會、基隆市林姓宗親會，2000），頁54。

外一支為日治末期至戰後來臺的福建惠安籍江氏，以淮陽為堂號，人數較少。近幾十年由於臺北等地江氏成立獨立的宗親會，較少年輕人參加，募款範圍亦在縮小，維繫不容易。

據引述自新北市三芝鄉江氏族譜的記載，「咸豐年間籌組江氏協會（宗親會前身），（江呈輝的先世）曾參與規劃與貢獻」。<sup>⑩</sup> 所謂的江氏協會，現在以江姓宗親會為人所知，亦是最早參與一年一度輪流基隆盛大的中元祭主普的姓氏之一。其聯絡宗親的範圍，與傳統宗親的網絡範圍有關。據1973年的記載稱：

本（癸丑）年輪由咱姓值各其事，推念（原文如此，筆者注）戶數無多，且部份分佈於臺北縣三芝、貢寮、頂雙溪、瑞芳、九份、金包里等處，欲求達成此一盛舉，端賴較有充裕財源，遂即於六十年度即發動各宗親日獻一元以上之專款作為主普費用基金。<sup>⑪</sup>

從捐款名單來看，成員包括現在基隆市六區（範圍遠大於日治時期的基隆市）、臺北市及新北市三芝、瑞芳、中和等八個區。在基隆市區內，居住在仁愛區的人最多，捐款額亦最大。從戰後的發展來看，其主要成員已經發生一個汰換的過程，傳統的江氏已經逐漸讓位於戰後移居臺灣的新江氏成員，不過，其主體仍然是早期便移民該地的江氏成員。按照連明偉的研究，「基隆的江姓人家大多為漳州人，約有一千餘戶，宗親會內會員約三百餘戶」。<sup>⑫</sup> 再根據《江氏大族譜》的記載，會發現來臺拓墾的江氏，福建人當中漳州府平和籍的人士特別多，其次為汀州府永定，亦有少量漳州府詔安縣人，分佈在臺灣各地。<sup>⑬</sup> 這可能亦解釋了後來基隆的江氏和全臺各地江氏的密切聯絡，學者便觀察到，「每逢中元祭典，除臺北縣市及高雄、新竹等地的江姓宗親會均有參與外，香港及世界江姓宗親會及六桂宗親會也都有所贊助」。<sup>⑭</sup>

<sup>⑩</sup> 江春霆纂修，《江氏大族譜》（臺北縣新莊市，2003），頁366。

<sup>⑪</sup> 江嘉輝，〈癸丑年慶贊中元主普報告書〉，收入江嘉輝、江丕來主編，《（基隆）江姓宗親會癸丑值年主普報告》（基隆：基隆江姓宗親會，1973），頁1。

<sup>⑫</sup> 連明偉，《雞籠中元祭：儀式、組織與權力》（臺北：臺北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未刊碩士論文，2009），頁52。

<sup>⑬</sup> 江春霆纂修，《江氏大族譜》，頁344-348。

<sup>⑭</sup> 連明偉，《雞籠中元祭》，頁52。

在基隆市江姓宗親會會館內，亦有東峰公神明會。正面是拜祭神明的神龕，兩尊大神明並肩坐在上面，右側居尊位、帶着官員式帽子的是東峰公，他號稱是入閩十三世祖，明正德年間帶領子弟擊賊而亡；左側帶類似道士帽的則是江大人爺。據江先生說，主神歷史比較久，有800多年了；江大人則有300多年歷史，其來源是當地被疑有姦情、冤屈而死的江縣令及其養女，為惠安各姓氏五大宗族都拜（陳、郭、駱等）的神明，分靈遷臺亦有60年。顯然，在神明拜祭上，同樣融合了早期江氏及後來江氏兩支不同的傳統。就認同而言，早期江氏一支可能會講客家話，但年代久遠，現在連70歲以上的老人家都不會講了。而晚期的江氏，參加的是閩南同鄉會，完全沒有任何客家認同。

劉唐杜姓宗親會今天也被認為是會員有較多客家人的字姓會。其會館面對基隆海港，視野開闊，空間寬敞。裡面掛滿會所的相關資料，亦有眾多年輕人參與其中，感覺頗有活力。據會中人士介紹，該宗親會是由金雞貂石的人士組成：唐姓各地都有，金山比較多；杜姓以八斗子特別多；劉姓則金山、瑞芳的較多，大部份不是客家人，但戰後的確有越來越多客家人參與其中。根據第三屆會長劉阿進（1975-1977年在任）的介紹，戰後初期試圖凝聚為數不多的劉姓、形成社會組織的人是劉猛，他的籍貫不清楚，日治之前出生，至少父親便已經在基隆做生意，他繼承父業經營雜貨商、石炭、船舶搬運工的承包等。1931年地方志記載，他「深得理財之道，獲利頗巨」。<sup>⑤</sup>他最早主持該會，但其時尚未登記。正式有記錄的基隆劉唐杜第一任理事長的是金山人劉春柏（1946-1966年任），臺北帝大醫學部婦產科畢業。第二任理事長劉木生（1966-1975年任），臺北師範學校畢業，是基隆國小校長。第三任理事長劉阿進則是新竹竹北中興村客家人，從小接受日本教育，並曾赴日本就讀軍校，二戰後方才返回臺灣；1953年他遷居基隆，經營西藥房，在做基隆市議員的時候被拉入會。1970年代時還只有一個姓氏，後來查閱大陸的資料，發現三個姓氏都是由劉氏分出來的，遂再聯合成為劉唐杜宗親會。<sup>⑥</sup>繼任者是劉阿月（1977-1989年在任），任劉唐杜第四至第六任理事長。

聯姓會由戶數較少的各姓氏構成。在這些姓氏的歷史簡介當中，可以看到不少關於早期移民或移入者中有粵籍或潮州籍的記載，例如基隆市的黃

<sup>⑤</sup> 簡萬火，《基隆志》（《中國方志叢書》本），頁19。

<sup>⑥</sup> 訪談筆記：劉阿進，2016年5月30日、2017年4月25日，基隆南區扶輪社。

姓，「乾隆中葉亦有粵籍移民黃梅怡入墾基隆」。<sup>⑳</sup>不過這些早期移民情況的記載，往往抄自綜述性的姓氏源流，他們與今日的基隆各宗親會之間的關係、各籍所佔比例及變動情況等，其實極為模糊。不過，無論從聯姓會成員，還是研究者的立場而言，這個問題都不重要。相對於早期的各姓氏，戰後這些聯姓會的移民色彩更強，如何聯合不同來源同姓人士，才是更為重要的問題。

儘管如此，在當地人的印象當中，聯姓會當中的邱（丘）姓、鍾蕭葉姓兩個宗親會，其成員便大部份是客家人，而這些人移民基隆的歷史均非常晚，不少人更是戰後才移入。據記載，基隆的邱姓多是北部的桃竹苗一帶後來移入者，「丘、邱姓移民大多是來自粵籍」。<sup>㉑</sup>鍾蕭葉姓宗親會是1963年才正式成立，不過之前的1954年便開始參加聯姓會的活動。研究者便觀察到，「雖此三姓多粵籍，而非雞籠中元祭欲融合之漳泉二籍，然鍾蕭葉姓入境隨俗且認同雞籠中元祭慎終追遠、族群融合之主旨」。<sup>㉒</sup>據該會總幹事葉秋林介紹，鍾蕭葉三姓聯合的宗親會是全臺唯一，拜祭三山國王（大王），神像有兩尊，分別由理事長和爐主拜祭。葉秋林加入該會之後的先後任理事長葉廣成、劉邦常均是客家人，並且曾在客家會擔任職務。現在會員四五十個，最活躍的是葉姓，<sup>㉓</sup>從早期記錄來看，葉雲特便是其中之一，而他戰後最早加入的組織並不是這個宗親會，而是廣東同鄉會。

#### 四、戰後初期的「廣東同鄉會」：籍貫下的合流

日治至戰後時期基隆市的客家人故事，與之前的本地住民並沒有太大關係。當時，有少量桃竹苗一帶的客家人來到基隆做生意，從事鐵路、煤礦等行業。但是直到1937年，其人數尚不足800人，只佔漢人總人口的1.2%、整個城市總人口的0.9%。<sup>㉔</sup>戰後初期經濟復甦的背景下，來基隆尋求機會的客家人日益增多，外省客家人亦紛紛湧入，成為該地人口最多的群體。到了戰

<sup>⑳</sup> 臺灣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撰，《雞籠中元祭》（基隆：基隆市政府民政局，1989），頁75。

<sup>㉑</sup> 臺灣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撰，《雞籠中元祭》，頁74。

<sup>㉒</sup> 連明偉，《雞籠中元祭》，頁66。

<sup>㉓</sup> 訪談筆記：葉秋林，2016年8月15日，基隆慶安宮。

<sup>㉔</sup>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常住戶口統計》（昭和十二年〔1937〕）（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38），頁243。

後的1959年，該地廣東省籍人口有4,198人，雖然較戰前的數字翻了幾倍，但只約佔總人口的3.0%，且其中大部份可能都是外省人。<sup>④</sup> 10年後的1969年，廣東省籍人口已經躍升至基隆市總人口7.6%，而最大宗的福建省籍為21.6%，其次浙江省籍佔19.6%（以工人、船員為主），再次為山東省籍佔14.6%。<sup>⑤</sup>

在早期基隆不同來源、不同行業和不同地域內的客家人內，或多或少存在非正式的人群組織，並不一定有名有號，卻因同音相近，彼此聯絡。這些大大小小的組織成員，有的進入戰後正式組織之中，便把早期淵源連到自己的小群體之上。事實上，這類的多頭組織可能實在不止一端。根據基隆當地研究者的調查，在日治時期，基隆因煤礦、金礦繁榮一時，大量各地客家人移居基隆。當時基隆社會上也已經有一批客家人在商界、教育界、公務和金融等機關活躍，彼此有聯誼活動。而戰後移居臺灣基隆、在政府任職的廣東人，也自行形成廣東人的組織。<sup>⑥</sup>

基隆市的本省和外省客家人不但在戰後初期建立關係，前者更與後者匯流，形成共同的組織——「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現在這個組織依舊存在，在基隆市南榮路沿坡而建的公寓中。根據其會史記載，該會早在1947年7月便已經成立，當時還是非正式登記的聯誼組織，參加者是居住在基隆市的廣東鄉親，主要活動是每週六晚在珠海樓集會餐敘。<sup>⑦</sup> 而據同鄉會總幹事潘淞浩的介紹，該會曾經有會員1,000多人，老兵很多，後來大部份過世，現在約200人左右。<sup>⑧</sup>

從早期名單來看，該會會長主要是廣東省籍的人士，包括客家人。最早期的會長巫明福，是廣東豐順客家人，接任的岑長發則是廣府人。<sup>⑨</sup> 其後1950年代上半葉任會長的何蓋民和姚煥洲，均是在近代歷史上留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何蓋民是廣東新會人，很早便與海員工會及國民黨有關係，曾任職

④ 臺灣省戶口普查處編，《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第二卷·臺灣省》（臺北：臺灣省戶口普查處，1959），頁563-564。

⑤ 儲有科等主修，洪連成編纂，《基隆市志》，頁50。

⑥ 許月梅主編，《基隆市少數族群——客家文史調查與研究》（基隆：基隆原鄉文化協進會，2001），頁13、26。

⑦ 資料室，〈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沿革〉，載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特刊出版委員會編，《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特刊》（基隆：基隆市廣東同鄉會，2011），頁8。

⑧ 訪談筆記：潘淞浩，2016年5月11日，基隆市廣東同鄉會。

⑨ 許月梅主編，《基隆市少數族群》，頁26。

中華海員總工會，戰後來臺則是海員工會選出的第一屆立法委員。<sup>④⑧</sup>何蓋民任會長時，基隆市廣東同鄉會尚未正式登記，至1951年後，則走上組織化之途，每屆會長任期兩年。首任正式會長姚煥洲，便連續出任兩屆。他是海豐縣汕尾鎮人，曾就讀於廈門市集美水產航海學校，留學日本北海道帝國大學水產專門部，回國後曾從事多項與水產有關的事業，1935年後致力於廣東汕頭和汕尾地區創立和經營水產技職學校，日本侵華時期曾屢次遷校，被視為廣東水產與航海教育的開拓者。1947年，他應集美學校校友之邀到臺灣基隆，出任集美漁業公司董事長，從此在基隆經營生意。<sup>④⑨</sup>這兩位人物，均與海運事業息息相關，也與基隆地區航運業發達的特性相關，其早期參與聚會的廣東同鄉，可能職業亦多與此有關聯。

不過，從1950年代中葉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1955年以降的二十餘年中，廣東市基隆同鄉會的會長一職，大部份時間乃是由移居基隆的桃竹苗一帶客家人擔任。大東旅社負責人徐榮漢，以及永泰西藥行負責人陳運財，分別是第三、第四任會長。基隆市議員李阿土，則分別出任第五、第七和第10任會長。第11至13任會長，則是由新竹客家人、西藥業及市議員劉阿進和警察、茶室及飯店業者葉雲特出任。<sup>⑤⑩</sup>

移居基隆的桃竹苗一帶客家人，開始與基隆的外省客家人逐漸認識，在日常接觸中建立關係。前任總幹事潘淞浩曾舉一個例子，他大約是1950年代移居基隆，其梅縣的中學同學邱則漢畢業於警官學校，被派到基隆市警察局服務，因為登記獵槍的關係，認識了從花蓮搬到基隆的客家人劉興富，雙方講話的口音差不多，因此結識，日後關係亦篤。這樣因為日常接觸而認識，並因語言關係而接近的例子還有很多，潘淞浩後來便同樣參加臺灣客家人定期的聚餐活動。<sup>⑤⑪</sup>

以上出任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會長的客家人，職業各不相同，但都是在當時社會較有地位的客家人。尤其常被人提及的，基隆地區客家人多從事西藥

④⑧ 中國海員工會廣東省委員會編，《廣東海員工人運動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213；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上冊，頁1115。

④⑨ 葉良方，〈廣東水產與航海教育事業的奠基者——姚煥洲先生傳略〉，《嶺南文史》，2011年，第3期，頁48-50。

⑤⑩ 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特刊出版委員會編，《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特刊》，頁10。

⑤⑪ 訪談筆記：潘淞浩，2016年5月11日，基隆市廣東同鄉會。

行業，在其中亦有體現。<sup>52</sup> 為何從事西藥行業容易成為地方領袖？出生於新竹竹北地區的劉阿進，便是1950年代上半葉追隨其叔父來到基隆，以開西藥房維生。據他介紹，當時基隆有很多桃竹苗地區坐火車上來賣菜、雞鴨鵝等的客家人，當日往返。當時基隆社會秩序並不好，這些人遇到糾紛，往往會向其求助調解。<sup>53</sup> 因為打架鬥毆者往往要到藥店尋求幫助，藥店亦往往成為各種消息匯聚的中心，有能力經營藥店者，就常扮演調解者角色。在這一背景下，一些具有一定政經基礎和社會地位的客家人，便成為桃竹苗一帶客家人的代言人。1950年代以降，劉阿進便常常擔任這樣的角色，據他介紹，當時社會治安並不好，基隆又多山，小販、碼頭工人等亦多，常有打架糾紛發生。當客家人捲入糾紛，便需要他這樣的人出來調節，還有如下幾位人士會出面：婦產科醫師劉鼎棟（新竹人，亦是劉阿進的叔父），建築公司董事長黃勝泉（桃園人），議員李阿土，基隆警察、北投飯店業主葉雲特等。初期並無定期聚會，但後來有聚餐的形式。

那麼，這個組織到底有多少人，不同來源的人佔多少比例？由於時間久遠很難有明確答案。不過根據劉阿進的說法，在他1971年擔任會長之前，該組織還是外省廣東人為主，大部份是客家人，也有潮州人。其後他拉了不少本省客家人進入，漸漸演變為本省客家人為主的局面。<sup>54</sup> 這大概亦引起外省廣東人的不滿。

這樣一個本省「廣東人」（客家人）、外省「廣東人」（包括客家人）融合的局面，隨時間的演變，尤其是基隆市區發展帶來的問題，衍生成矛盾的根源，並最終導致二者的分道揚鑣。

## 五、分庭抗禮：客家脫穎而出

當代基隆市的客家同鄉會，位於基隆繁華逼仄的市區的一棟大廈內。會所辦公空間面積並不大，牆的上方懸掛着會長和歷屆理事長的照片，下方是1983年購買會館的捐款名錄，總共有200位左右的客家人為此捐款，還有近兩年義民祭等活動的照片。

相較之下，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的會產要顯得更為豐富。早期基隆市廣東

<sup>52</sup> 許月梅主編，《基隆市少數族群》，頁18。

<sup>53</sup> 訪談筆記：劉阿進，2016年5月30日，基隆南區扶輪社。

<sup>54</sup> 訪談筆記：劉阿進，2016年5月30日，基隆南區扶輪社。

同鄉會並沒有固定的會所，而以聚會地點「珠海樓」，以及會長個人住所為會所；直到1980年1月，方遷至離開港口稍有距離的南榮路的現址。<sup>55</sup> 會所位於沿山而建的逼仄大廈內，是一座由兩棟住戶打通的寬敞會館，大廳中擺放着長形桌椅，至少可以容納幾十人開會。左側是辦公和紀念的空間，裡面安放着「國父」孫中山的銅像，根據牆上的碑文，也是1983年購置會館同年設。左右兩側牆上還擺放着老照片、各種匾額和獻詞等。在同一棟大廈中，它還擁有另外六戶房產，出租給他人收取租金，目前每年可收租金42萬餘元。

而廣東同鄉會之所以擁有此地的會所及房產，則要追溯到該同鄉會與「廣東義地」的關係。此地具體的歷史淵源並不清楚，據同鄉會的資料記載，「我粵籍先賢秉於愛國情操，認保國守土乃民之天職，外侮犯境豈有坐視之理？乃糾合相親群起抵抗，因而壯烈成仁者多。嗣經善心人氏釀資殯葬於基隆市南榮路山麓，並豎『萬善同歸、廣東義地、皇清光緒戊子年（1888）』石碑一面」。<sup>56</sup> 由此猜測，當與清末以來當地為防禦列強入侵，從開山撫番到中法戰爭等一系列事件有關，這些地很可能是中法戰爭時，在基隆犧牲的廣東籍移民或義勇的葬地。據該會前任總幹事潘淞浩、主任秘書朱家聲告知，該義勇墓地原本有自己的管理人（守墓人），戰後因為同籍隸廣東，在廣東同鄉會成立後，便由其管理。管理人還曾寫一紙證明，將該土地捐贈給廣東同鄉會。<sup>57</sup> 1971年由於基隆市政府進行都市更新計劃，拓寬南榮路，要求該會將葬地搬遷。當時遂發動捐款，購買了瑞芳四角亭現地，原址則改建為居住社區，本來分得17戶房產，其後陸續賣掉九戶，目前剩下八戶為會產。<sup>58</sup>

那麼，原本安葬於此的廣東義勇，現在又葬於何處呢？廣東同鄉會在新北市瑞芳區，還擁有一座祭拜往生同鄉的「廣東山莊」，面積超過三千餘坪（包括廣東公祠一千餘坪），每年的清明節和中元節舉行盛大拜祭活動。<sup>59</sup>

<sup>55</sup> 資料室，〈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沿革〉，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特刊出版委員會編，《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特刊》，頁8。

<sup>56</sup> 資料室，〈基隆市廣東同鄉會「廣東公祠」簡介〉，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特刊出版委員會編，《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特刊》，頁20。

<sup>57</sup> 訪談筆記：潘淞浩，2016年5月11日，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朱家聲，2019年1月21日、9月19日，基隆市廣東同鄉會。

<sup>58</sup> 訪談筆記：潘淞浩，2016年5月11日，基隆市廣東同鄉會。

<sup>59</sup> 基隆市廣東同鄉會，《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第廿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手冊》（基隆：基隆市廣東同鄉會，2015），頁3、6。

其門樓頗類似忠烈祠的格局，公祠內則擺放三百餘面牌位。<sup>⑩</sup>紅紙書寫的牌位上，登錄往生者的姓名，右上角則書寫籍貫，我們可以找到汕頭、潮陽、揭陽、惠東、陸豐、番禺、茂名等諸多廣東地名。據訪問該地時該處管理員介紹，可以放進來的主要是廣東和廣西人，其中潮州人最多，因為比較沒錢，做工的多，老兵也很多；梅縣其次。根據會中資料，上述人士均是戰後方陸續入祀的，至於清末廣東義勇的下落，會中已無跡可尋。據主任秘書朱家聲稱，該山莊內原有無名無姓的骨灰甕二三十個，或許與這些義勇有關。<sup>⑪</sup>

而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會產日漸充盈的過程，與客家人逐漸被排除在同鄉會之外、另組客家同鄉會的過程幾乎同步。在該會2011年為紀念建國百年出版的專刊中，收錄一份資料室提供的章程，在組織編制中便對入會資格和方式做了如下規定：

凡居住本會區內年滿二十歲以上屬廣東之男女及會員之配偶，  
填具入會申請書一份，繳交國民身份證影印本一份，二吋半身照片  
二張、繳納入會費一百元，具領會員證後成為會員。<sup>⑫</sup>

這一規定雖然可能是後來經過修訂的，但是對於我們了解該地「廣東」和「客家」的分道揚鑣則相當重要，因為今日訪問廣東同鄉會和客家同鄉會的早期負責人，均提到廣東同鄉會章程中的「廣東籍」一事，亦即參加的會員，必須是設籍在廣東者。由此便導致一個問題，那就是臺灣桃竹苗等各地客家人，其籍貫一欄並非是「廣東」，那麼他們是否有資格參加呢？

1970至1980年代基隆都市的擴張，與都會地產價值的增加，顯然是廣東與客家同鄉會分裂的關鍵。據劉阿進透露，當時廣東同鄉會發展成具有財產的組織，想選會長的人多了起來。在他想連任之時，同時有四五人想要選會長，於是想要爭奪會長之職的梅縣客語人士，想到這個辦法，要求必須有廣東籍身份才可參與。雖然最後投票自己的票數仍然過半，但是亦決定退會。

<sup>⑩</sup> 據統計，該公祠一、二樓共有龕位814個，其中往生者購買的龕位數為400個，尚在世者購買的龕位數為103個。不著撰人，《基隆市廣東同鄉會廣東公祠一二樓安厝閑人靈骨預定長生龍位清冊（會務人員）》（基隆：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手寫稿，時間不詳〔截至2019年9月〕）。

<sup>⑪</sup> 訪談筆記：朱家聲，2019年1月21日、9月19日，基隆市廣東同鄉會。

<sup>⑫</sup> 資料室，〈社團法人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組織章程〉，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特刊出版委員會編，《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特刊》，頁11。

他透露同鄉中亦有人對自己的決定非常不滿，不理解他為何把財產放棄掉。曾有人想提出告訴，結果最後亦作罷。<sup>⑬</sup>事實上，廣東同鄉會是否能夠合法擁有原安葬廣東義勇的土地，本身也經過劇烈的鬥爭。據同鄉會主任秘書朱家聲告知，一二十年前該會早期領袖之一、潮陽人許銀地曾告知，該義勇墓地原本的管理人將土地捐贈給廣東同鄉會後，股東有辦理過戶，但卻引發管理人之子與同鄉會的爭產官司。由於對方也無法提出明確權狀，經過與對方妥協（少部份房產過戶給其子），才終於合法擁有這部份財產。<sup>⑭</sup>

儘管排除了本省客家人，外省人中的客家人直到今日，還在基隆市的廣東同鄉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實際上該會自己也深刻認識到會內不同語群的問題，所以在章程中曾特意針對此點作出規定：

惟本會情形特殊，為加強廣東族群團結，發揚互助合作精神，俾各族精英均有參與改革會務機會。理監事選舉提名，得視當時籍貫比例，理事以七、五、三，監事以二、二、一為原則。<sup>⑮</sup>

上述文字中並沒有說清楚到底是哪些籍，但是透過訪談可知，代表人數所佔比例由高至低的分別是潮汕話、客家話和廣東話的群體。所以該會當中，以潮汕話群體最有權勢，在分裂之後擔任會長的主要都來自潮汕語群，客家話群體其次，廣東話者最少。從2015年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第26屆榮譽理事長、顧問、理監事及職員名冊來看，在總計30人當中，來自梅縣、蕉嶺、豐順客語地區者便達13人，與潮陽、潮安、汕頭、普寧、惠來等廣東靠海地區絕大部份講潮汕話者各佔一半，而來自南海、順德、合浦和增城者則最少。<sup>⑯</sup>

臺灣籍的客家人被迫從廣東同鄉會分出之後，立即另外成立一個組織——基隆市客家同鄉會，分庭抗禮的意味濃厚。該會亦名同鄉會，顯然便深受廣東同鄉會影響。今日的總幹事巫賜銀稱，他們是全臺客家組織中唯一叫做「同鄉會」的，因為會所用這個名字買的，所以更動不易。<sup>⑰</sup>這樣一種對於雙方分裂的記憶方式，強調的似乎是權力鬥爭的面向，臺灣客家人似乎

<sup>⑬</sup> 訪談筆記：劉阿進，2016年5月30日，基隆南區扶輪社。

<sup>⑭</sup> 訪談筆記：朱家聲，2019年1月21日、9月19日，基隆市廣東同鄉會。

<sup>⑮</sup> 資料室，〈社團法人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組織章程〉，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特刊出版委員會編，《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特刊》，頁12。

<sup>⑯</sup> 基隆市廣東同鄉會，《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第廿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手冊》，頁23。

<sup>⑰</sup> 訪談筆記：巫賜銀，2016年5月12日，基隆市客家同鄉會。

是被強迫離開該組織的。實際上，新興意識形態對於這一選擇的影響亦極大，它成為基隆臺灣客家人在這一分裂過程中亦有主動性的證據。

從政治環境和外交背景來看，1970年代正是客家意識如火如荼發展的時代。1971年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香港召開，兩年後在臺北召開，隨後1974年臺北成立世界客屬總會。基隆市廣東同鄉會中的臺灣籍客家人，積極參與這些活動，葉雲特當時便以基隆市中原客屬聯誼會會長的名義參加，劉阿進、李阿土等亦在其中，只是籍貫可能為呼應其廣東同鄉會成員的身份，寫的乃是其廣東省的祖籍陸豐與饒平等。<sup>68</sup> 另一方面，他們也未放棄在廣東同鄉會中的職務，劉阿進（市議員）與葉雲特（家具工廠負責人）分別於1973年及1975年出任廣東同鄉會會長。<sup>69</sup>

而臺灣籍客家人的腳踏兩隻船，或多或少引起廣東同鄉會內其他成員的非議。獨立發展後，初期其組織尚以基隆市中原客屬聯誼會為名，擴充會員，顯示尚不脫來自於臺北潮流的影響。約1970年代登錄的會員通訊錄，載有來自基隆市各區的會員556人，大部份都是桃竹苗人士，少量為南部、東部及個別大陸省份者。<sup>70</sup> 至遲到1983年購置會所時，已經登記為基隆市客家同鄉會。<sup>71</sup> 據現任總幹事巫賜銀介紹，自己接手時，會中總共有登記在冊的會員六百餘人，目前實際繳交會費的為一百餘人。除每年辦活動向政府申請經費外，會務經費大宗主要來自於理監事和顧問的固定捐款。十餘年前開始，客家同鄉會內部亦逐漸分裂，不少人分出去另外成立組織（即客家文化協會、世界客屬基隆分會）、申請政府計劃或活動等。<sup>72</sup>

近年來，隨着客家意識的興起及地方政治的運作，客家同鄉會角色日漸重要，在基隆市政和客家相關活動中時常可以見到其身影，與各級政府負責客家事務的部門、桃竹苗等地客家政治人物有較多互動；近些年爭取經費舉辦客家天穿日、義民祭等活動，最近基隆市也爭取到建立客家文化會館（原信義區舊圖書館）的機會，建設經費得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及市政府補助，

<sup>68</sup> 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編輯委員會編，《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臺北市：世界客屬第二次懇親大會實錄編輯委員會，1974），頁613-615。

<sup>69</sup> 基隆市廣東同鄉會特刊出版委員會編，《基隆市廣東同鄉會慶祝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特刊》，頁10。

<sup>70</sup> 基隆市中原客屬聯誼會編，《基隆市中原客屬聯誼會名冊》，手寫稿，未詳年代。

<sup>71</sup> 基隆市客家同鄉會，〈基隆市客家同鄉會購買會館樂捐芳名錄〉（1983），懸掛於基隆市客家同鄉會。

<sup>72</sup> 訪談筆記：巫賜銀，2019年1月22日、2019年10月31日，基隆市客家同鄉會。

預計2019年底即可啟用，發展呈現欣欣向榮之勢。<sup>⑬</sup>而廣東同鄉會則面臨老一代會員逐漸凋零、新會員招收不易等問題，雖然擁有會產，但由於是社團法人，轉賣和維護問題均頗為棘手。如今該會對外主要與位於臺北的世界廣東同鄉總會、基隆市的潮州同鄉會等有聯絡。<sup>⑭</sup>無論兩會未來的發展如何，至少在當代的形勢下，兩會已經漸行漸遠，沒有多少交集的空間。

## 六、結論：誰的客家認同？

縱觀20世紀臺灣客家人形成的歷史，期間既有從清初以來幾百年移民歷史的影響，亦有進入日本殖民地時期以後種種近代社會變遷的深刻影響。從基隆市的例子中，可以鮮明看出「客家」從虛構走向歷史實體的過程中，人際關係的邊界和想象如何不斷重建，以及歷史元素如何被重新組合，從而形成有別於臺灣鄉村地區的獨特客家族群面貌。

基隆市有講客家話的人口活躍，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中葉時期。而其來源地的東北海岸汀州府移民更可以追溯至清初。學者早就注意到這一群體的存在，也發現早在清前期，他們便在新北市新莊地區建立一系列寺廟、書院等設施，形成獨特的文化風貌。不過，分散在臺北盆地的其它汀州人聚落，或再移民至其它縣市者，其認同則往往要視乎當地的社會、語言環境而定。<sup>⑮</sup>從基隆清代以降的發展歷程來看，當地擁有極高比例的汀州府移民，雖然他們及少量漳州府移民早期可能講客家話，但是在當地既未形成獨特的籍貫認同，更未有明顯的主客之別乃至族群特徵。這讓我們聯想到朱希祖曾在羅香林著《客家研究導論》序言中提到，「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時移世易，則主客不分，如魚之相忘於江湖焉」。<sup>⑯</sup>放在基隆市的汀州人身

⑬ 訪談筆記：巫賜銀，2019年1月22日、2019年10月31日，基隆市客家同鄉會。

⑭ 訪談筆記：朱家聲，2019年9月19日，基隆市廣東同鄉會。2017年，廣東同鄉會總幹事潘泓浩曾在客家同鄉會總幹事巫賜銀的邀請下，參與其義民祭聚餐，是目前為止唯一的「破冰」之舉，未來發展則還有待觀察。訪談筆記：巫賜銀，2019年10月31日，基隆市客家同鄉會。

⑮ 廖倫光，《臺北縣汀州客尋蹤》，頁10-29；賴文慧，《臺灣汀州客二次移民研究：以苗栗縣造橋鄉平興村謝姓家族為例》（新竹：臺灣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未刊碩士論文，2008）；練肇嘉，《當代臺灣練氏族譜的製作與分析：從修譜者角度所作的反身性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未刊碩士論文，2015）。

⑯ 朱希祖，〈客家研究導論序〉，收入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廣州：興寧希山書藏，1933），頁1。

上，可謂再恰當不過。這與中國大陸華南以及東南亞以胡文虎為首的永定人在客家族群建構中的角色形成鮮明對比。

為何會出現這一情形呢？這與當地較晚的城市發展的歷程有關，也與特殊人群組織方式的形成有關。從當地的宗親會組織及神明拜祭上，依稀可以看到不同時期汀州府客家人活躍的痕跡，不過不同於臺灣北海岸鄉村地區同姓聚居的汀州社區，基隆都市環境下的字姓會，對於不同來源的同姓者多抱持開放態度，甚至主動納入後來崛起的新客移民，故而直到今天，當地盛大的中元祭典及字姓會花車遊行，仍是當地最鮮明的文化特徵。另一方面，來自汀州府的客語移民，清代即自認為是福建人，在科舉考試上亦擁有廣東客語移民沒有的便利。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更以籍貫登錄種族，他們自認為屬於福建種族，從而消融於講福老話的閩南人群體中。

客家意識在基隆市地區的出現，是戰後不同歷史時期新移民群體互動的結果，更經歷一個從剛開始融合於「廣東人」，到最後分道揚鑣的過程。由於汀州人不屬於廣東人，日治中葉他們就自覺地排除在廣東人的種族標籤之外，從桃竹苗等地逐漸移居當地的移民，躍居到歷史舞臺的中心，成為客家族群建構的核心力量。大量來自外省的廣東人移民（包括客家人），使得當地族群互動的情形更為複雜。戰後的客家同鄉會既脫胎於廣東同鄉會，又與之分庭抗禮，背後則主要是因為財產的膨脹及會務主導權的爭奪。除此之外，當時亦有另外一股源於臨近都市臺北的世界客家建構潮流，影響基隆客家人的選擇。外省廣東人通過強調「廣東人」的籍貫含義，從而排除臺灣客語群體；臺灣客語群體則拋棄「廣東」的外衣，轉而擁抱「客家」的族群標籤。前者以廣東山莊等彰顯自己的認同，而後者則以參與客委會主導的義民拜祭、天穿日等方式彰顯認同，從而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今天，很難再將兩者視為同一群體。

整體而言，在臺灣的客家歷史敘事中，當代基隆依然扮演比較邊緣的角色。然而，它卻是一個有意義的觀察個案，因為它彰顯的不止是臺灣客家族群建構的地域性，更凸顯出不同時期移民組合變化與近代城市發展的特殊關聯，是一個有別於傳統客家鄉村聚落的近代客家建構個案。

（責任編輯：唐金英）

From “Forgetting the Differences” to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The Forma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Keelung  
City from the Early Qing to the Present

Li-hua CHEN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vestigating how the identity of the Hakka group in Keelung City formed from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the pres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aiwan's social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how historical resources have been repeatedly reconstructed in social and academic contexts.

The history of the Hakka-speaking community in Keelung can be traced back to at least the mid-Qing dynasty. A survey on the origins of Han Chinese in Taiwan conducted under the Japanese governance showed that Keelung was once the area concentrated with the most Hakka-speaking people from Tingzhou Prefecture, Fujian Province. However,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this group at that time was not evident and was mostly covered under their Lineag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worship of deities. Their Hakkaness therefore became a collective subconscious. After WWII, Hakka-speaking groups across Taiwan became associated with the newly arrived “Cantonese” group, with whom they formed the Guangdong Natives Association together.

---

Li-hua CHEN,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Room 210, 2nd Floor, Education Hall, No. 101, 2nd Section, Guangfu Road, Hsinchu city, Taiwan, R. O. C. E-mail: lhchen101@mx.nthu.edu.tw.

During the 1970s, the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of Keelung led to fierce competition for property rights within the Guangdong Natives Association, and the neighboring Taipei City ha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global Hakka center. Influenced by these two factors, the new Hakka group in Keelung started to separate itself from the umbrella of “Guangdong” and formed an independent community, the “Hakka Natives Associ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narratives, Keelung is seen as having a large Hakka community. This should be contributed to the efforts made by local elites and academic groups, who led to form a small-scale Hakka community in the post-war period and combined it with the large-scale Hakka-speaking populations who have lived there for a hundred years.

**Keywords:** Keelung City, Hakka, Guangdong, identity, Lineage Association